

论中法战争与云南及黑旗军的关系

牟安世

中法战争与云南和黑旗军的关系是极其密切而不可分割的，它表现在当时战争中人们所谓的“移刘团而通滇路”^①这个问题上面。所谓“刘团”，指的是我国民族英雄刘永福所领导的中国人民武装部队——黑旗军；所谓“滇路”，则指的是法国殖民主义者侵略我国云南的“红河路线的问题”^②。不“通滇路”，则法国侵略者无从侵入云南；不“移刘团”，则他们就不可能“通滇路。”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移刘团而通滇路”的问题在前后绵延了十二年之久的中法战争过程中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关键问题，战争的发生、发展和解决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来进行的。为了认识它的重要意义，我们在这里提出三个问题来作进一步的探讨。它们是1873年底云南面临的危机、第一次纸桥之战的历史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中法战争爆发时间和分期等问题。现就这几个问题提出一点个人看法，以供讨论，不当处请指正。

（一）1873年底云南面临的危机

我国云南在1873年底所面临的法国侵入的危机，是由安邨和堵布益等人在法国巴黎政府海军和殖民部部长播多等人的支持下，在法属交趾支那总督游悲黎的组织下精心策划出来的。这场侵入事件，由于法军在第一次纸桥战争中的惨败而中途夭折，以致常被忽视，但它的严重性却是十分明显的。

法国海军军官安邨和军火商人堵布益等都是下定决心，要为法国资本、帝国主义掠夺殖民地而效劳的狂热分子，都在我国云南和其他各地活动多年，对云南抱有极大野心。安邨认为：云南矿产资源非常丰富，“富饶之地极多，取携良便，不啻百宝之罗列”；“云南物产富饶，俨一利藪”；特别是铜矿，开采时“若用人得当，调度有方，将铜销售欧洲，则云南一省便可为天下至大商埠”。因此，他才在1866年至1868年率领远征队去云南“冒死游探，亲历采记，”以“宣力国家”^③。堵布益则宣称：“只有一个思想在激发着”他，“这个思想就是，使法国从他自中国人所胜利取得的伟大局面”、即法国侵略者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于

1858年和1860年的中法《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里所攫得的特权中“获取利益”；“其中把红河开放以便自由航行通商，成为我固定的思想，我并且坚持地追求其实现。”^④

由于中国本身在清政府的腐败封建统治下，当时正处于边疆危机四伏的年代；国内又“各地骚乱，北京政府无力平定”，特别是在云南爆发了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运动，使堵布益得到了一个向云南提督马如龙提供军火武器的机会，因而“获得他的信用”^⑤。另一方面，英国也在这时力图侵入云南，安邨已经看到了一本“由伦敦出版、德国翻印的最新地图，云南被画成一个完全和中国隔离的王国，并名之为Panthays王国——此项名称，是英人给与这省回教人的。这和对缅甸英国属地的着色法是相同的，英国预告将取得这个属地”。因此，在安邨看来，必须立即抢在英人之前对云南先下手，如果一旦“云南置于英国势力之下”，那么法国的“一切企谋，定将无能为力”^⑥。安邨认为：“天下之地，尽人可有，唯在深谋远虑之人捷足先得耳”^⑦。这句话充分地暴露了这个掠夺殖民的大海盗的本色。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迫不及待地进行着准备侵略云南的阴谋活动。堵布益在1872年底组成了一支红河远征队：拥有一艘兵舰“布列因号”和武装作战船“红江号”与“老街号”，并有“蛮耗号”和“山西号”等蒸汽轮船，往来于云南和东京之间。随后，法属交趾支那总督游悲黎又立即从中国召回安邨，派他率领侵略军前往东京。1872年11月3日，安邨会同堵布益到达河内，发动战争。11月20日攻占河内，12月4日取海阳，5日陷宁平，10克南定。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法军势如破竹，“征服了东京三角洲地带”，“组织了一个本地人的行政机关，开始行使职权。”法军在东京的迅速胜利被法国侵略者看作是“安邨的惊人的史诗事迹”^⑧。在这样顺利的条件下，安邨和堵布益等人就准备从东京沿着所谓的“滇路”侵入云南去“建立法国的军械制造厂”，“并沿红河修建铁路，把越南与云南连在一起”，从而“在印度支那建立一个与英国抗衡的大帝国”^⑨。鉴于云南地处云贵高原，“东接黔蜀，南控交趾，西拥诸甸，北距吐蕃”^⑩，形势冲要，他们设想，有了云南，“在将来这个广大的帝国瓦解或瓜分时，可能作为侵略的前锋”^⑪。

因此，在中法战争中，“法国人的目标是、而且从一开始就是中国的云南省”^⑫。这就是1873年底云南所面临的法军侵入的严重危机。

（二）第一次纸桥之战的历史作用

这场法军侵入云南的严重危机，是由于黑旗军在第一次纸桥战争中所取得的歼灭战的胜利，从而迫使其中途夭折的。

黑旗军是在原中国农民起义军领袖刘永福领导下的一支由“一半是爱国百姓、一半是游击战士”^⑬组成的中国人民的武装部队。他们的根据地在保胜，雄据红河上游，既对下游东京法军造成军事形势上的威胁，又是法军企图侵入云南的必由之路。看来无论从巩固东京的战果来说，还是从进一步侵入云南来说，法国侵略者对黑旗军都有一场不可避免的激战来最后解决问题。因此，他们在事前就早已对黑旗军作过调查研究。早在1871年，堵布益准备在云南和东京之间贩运军火武器之际，他曾由云南提督马如龙提供卫队去蒙自，并由蛮耗乘船到了保胜，“在老街看到黑旗军首领刘永福”^⑭的。到1873年10月，他的远征队在馆司“添运粮食，黑旗军使我们付价甚昂”，堵布益于是亲自出面向黑旗军宣称：“我将从老街至河内全区把你们歼灭净尽。”^⑮换句话说，他马上就要配合安邨侵略军来消灭黑旗军了。在他看来，用破旧武器装备起来的黑旗军，同越南顺化王朝在东京的军队一样，是没有什么战斗力的，是不堪一击的。

1873年12月21日（清同治十二年十一月二日），一场法国侵略军与黑旗军之间的激战终于在河内城西二里许之纸桥地方爆发了，这就是名闻中外的第一次纸桥之战。它的结果与堵布益的估计正好相反，法国侵略军不仅没有歼灭黑旗军，反而被黑旗军所歼灭。

战事的经过是：业已占据东京三角洲的不可一世的法军统帅安邨“先带法兵向西门外出仗来攻”黑旗军，到纸桥“搦战”。刘永福“即率队过桥，与渠交攻，互相射击。公喝令加劲花红，各军队伍，奋勇向前，悉力攻敌，势极猛烈。少时，法兵大败，遂退向西城门而奔。安邨及各将官在后，压以退走。公下令赶追，随击随赶，赶到西城外半里许，法各将走得力尽筋疲，将到城时，聚作一团，概被公等部众上前尽行斩首，并斩散兵数十人，大获胜仗。斩骑马（即安邨——引者）者，系先锋吴风典之功。是役也，枪斃法兵无算。”^⑯据法方记载，这个被认为是“法国自史以来最勇敢的和最热心的探险家”^⑰和统帅安邨，是在失败后回到逃窜，行于罗城地方，被黑旗军“伏兵所杀”^⑱的。与法军相比，黑旗军的武器装备是极为逊色的，但刘永福运用了迂回包围、出其不意的“分布散击”^⑲的游击战术，加以

越南人民的支援和赞助，就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战果。

第一次纸桥之战是黑旗军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在东京重镇河内城郊所进行的一场举足轻重、转危为安的歼灭战，它的历史作用是极端重要的，影响极为深远。

首先，它起到了援越抗法的作用。在这次战役以前，堵布益根据法军在东京三角洲的胜利和1862年至1867年法军占领越南南部的经验认为，法国是“可以不受抵抗而取得东京的”，因为，“我那时已是这个国家唯一的主人。我能够在那里建立民族的黎朝，把它置于法国的保护之下，且不难以二百名教官，在这里组织足以维持秩序的民兵。”^④可是，事与愿违，第一次纸桥之战的结果却使法国侵略军“从红河撤退了，在安南人所收复的河内城中，法国的国旗被撕得粉碎了，堵布益也被赶走了，安邺和堵布益的活动成果所遗留下来的唯一痕迹就是，焚毁了乡村，殉难的基督教徒和处境危险、为保住海防而留成在那里的四十名法国兵了”^⑤。它使得“法人寝谋，不敢进吞越南者，将逾一纪”^⑥，这就是说，它推迟了越南的殖民地化。

其次，第一次纸桥之战还起到了保家卫国的作用。它使法军乘胜席卷而来，长驱直入，侵略云南的美梦变作了一枕黄粱，一举而解除了当时云南所面临的严重危机。其实，何只云南，连广西在内，法国都是有巨大野心的。照后来云贵总督刘长佑回忆他当时在广西巡抚任上的情况是：法国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复通贼将黄崇英，规取越南之东京，聚兵合谋，思渡洪江以侵凉山诸处，又欲割越南、广西边界地六百里为伊驻兵之所”^⑦。随着第一次纸桥之战的胜利，法国对广西的狼子野心也一起付诸东流了。否则，他们就会像沙俄侵略军在一年多以前，即1871年7月强占我国西北伊犁重镇一样，步其后尘，乘胜占据蒙自或蛮耗或镇南关等地，清政府也很可能象他对待俄兵的暴行一样，一筹莫展。

其三，第一次纸桥之战在很大的程度上起到了规定整个中法战争的历史进程和格局的作用。这一点可以由它对中法双方面的深远影响来说明：

1. 在中国方面，假定当时在保胜没有黑旗军这样一支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或者说假定虽有这支力量而是按照侵略者的预谋将其“歼灭净尽”的话，那么，法国就会在根本不通知清政府的情况下把东京沦为他们的殖民地，并由所谓“滇路”侵入云南，其结果就不一定会爆发我们目前讨论的这场中法战争了。即使爆发，那它也不可能是在这样一种模式下进行的。因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的清王朝，在法国侵略者看来，只不过跟越南顺化王朝是一丘之貉，没有什么两样的。当时，法属印度支那总督游悲黎由于纸桥惨败不得不把法军从东京撤退，但是，他对这个撤退持什么样的看法呢？他说：“在最近期间撤回我们诸领事的扈从以及执掌组织与监督海关的官员，而把本地行政完全交由土著政府自行管理，缩减法国外交领事人员的权限，使他们象在中国或在日本所行使的职权一样。最后，让安南的独立在我们看来，完全与中国及日本相同”^⑧。游悲黎的看法固然十分狂妄，但也多少反映出当时在不平等条约控制下的远东各国的实情。在这种看法下，法国侵略者如果能够独立地解决越南问题，他们就根本不会去理睬清政府。当年他们并吞越南南部地区，甚至派出安邺远征队长期深入云南活动之际，又何曾有片纸只字照会过清朝政府呢？只是在第一次纸桥之战和黑旗军坚定的抗法斗争的条件下，才有1874年的越法《第二次西贡条约》，才有1875年法国驻北京代理公使罗淑亚就越南问题致中国的照会，才有顺化王朝向清王朝派出贡使求救的机会，才有1882年援越清军的进驻东京。

2. 在法国侵略者方面，黑旗军在第一次纸桥之战以后，在中法战争的全部过程中，始终是徘徊在他们头上的、摆脱不了的幽灵。他们总是战战兢兢，经常需要“回忆安邺司令的远

征的惨痛结局”和这一结局对他们所造成的“严重的打击”^②，经常需要警惕“避免不幸的安邨所犯的错误”^③。尽管如此，他们依然避免不了覆辙重蹈；而黑旗军在第一次纸桥之战胜利的鼓舞下，又在同样的地方取得了同样的战果，这就是1883年5月19日（光绪九年四月十三日）的第二次纸桥之战，法军统帅李维业遭到了安邨同样的身首异处的下场。他们野心不死，总想歼灭黑旗军，又总是被黑旗军歼灭；结果不得不把“移刘团而通滇路”的内容暗中打些折扣。对“移刘团”，由“歼灭净尽”变成“驱逐黑旗军”^④；对“通滇路”，则由安邨和堵布益等人妄图把云南变成法国的殖民地后退出东京为他们的殖民地，暂时把他们对云南的狼子野心控制一下。直到中法战争即将结束之际，黑旗军在法国总理、“东京佬”茹费理的心目中，依然是头等重要的大问题，依然是他摆脱不了的幽灵。他认为黑旗军的根据地保胜是“红江航行的钥匙”，“老开留与黑旗军，等于留下房子的钥匙”^⑤给他们，法国就不可能建立起它对东京的统治。

（三）中法战争爆发时间和分期问题

由于第一次纸桥之战不仅起到了援越抗法的作用，并且还起到了保家卫国的作用，特别是它在很大的程度上对中法双方都起到了规定整个中法战争的历史进程和格局的作用，因此，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的抗法斗争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中法战争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第一次纸桥之战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中法战争爆发的起点，一个取得了歼灭性的胜利的初战。现在一般的中国近代史，包括拙著《中法战争》在内，都把1883年作为中法战争的开始，看来很有必要打破框框。

把中法战争的爆发提前到第一次纸桥之战到底有什么必要和根据呢？

首先，第一次纸桥之战乃是中国人民的武装部队对法国侵略军的首次武装冲突，它本来就是中法战争的起点。什么是战争？战争就是武装冲突。因此，它在根本上符合于历史事实；事实是最顽强的东西，除了承认以外，别无他法。

当然，黑旗军在那时并不是清朝政府领导下的官军，甚至还被中外反动派诬蔑为所谓“匪党”，而黑旗军领袖刘永福又曾经接受过越南顺化王朝的封爵；因此，黑旗军似乎不足以代表中国去同法军作战，所以他们同侵略军之间的武装冲突就算不得是中法战争。不过，我们如果开阔眼界，从当时历史的现实情况，即中、越、法三方错综复杂的具体条件出发，摆脱传统的封建史观的束缚，并且不把中国近代史看作完全只是清朝政府的历史，而把它也看作是中国人民的历史的话，那么，由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组成的黑旗军为了援越抗法、保家卫国，也是有资格代表中国去同侵略军作战的。在这种理解下，我们认为有理由把纸桥之战看作是中法战争的爆发。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得更开阔一些，看一看当时外国的情况，那么正好是在第一次纸桥之战的次年，在资产阶级统治下的英国，有一个名为格林的历史学家，在1874年出版了他的《英国人民简史》。人们认为，这本书的出版“在历史编纂学上是划时代的”。“朝代有兴亡，战争有胜败，而人民却总是依然继续存在着的。”格林这部著作中的“英雄就是人民”^⑥。在我们这里，作为人民英雄刘永福黑旗军的辉煌战绩，自然也应是中法战争的组成部分。

其次，假定我们把黑旗军反对法国侵略军的战争排除在中法战争之外，那么我们就难以按照历史发展过程的本来面目去如实地阐述中法战争的历史。如上所述，黑旗军的抗法战争曾经在很大的程度上，对中、法双方都起到了规定整个中法战争的历史进程和格局的作用；它在中法战争中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一支带有决定性的力量。没有它，中法战争的局面就必然改观；离开了它，我们就难以充分说明中法战争的前因后果，它和云南的关系以及结束

这一战争的1885年6月9日的中法《越南条款》的内容等等重大事件。实际上，中法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具有相当特色的战争：它开始于中国人民武装部队的反侵略战争，它在其发展过程中具有特别频繁的边谈边打的奇怪现象，它以法方的“不胜而胜”和中国的“不败而败”，来宣告结束等等；这些特色在基本上正是由于当时清廷政局和它包含了以刘永福黑旗军的战争在内这一主要特点所导致的。

最后，如果承认黑旗军的抗法战争和抵抗运动是中法战争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把中法战争划分为如下两个阶段：

1. 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代表中国人民进行援越抗法战争的阶段（从1872年到1883年），在这个阶段中，主要的战争有第一次纸桥之战、第二次纸桥之战、怀德之战和丹凤之战等等。在两次纸桥之战之间，由于游悲黎的撤军，有一个较长的休战阶段，正象十四世纪至十五世纪之间的英、法百年战争中由于各种原因有长期的休战阶段是一样的。

2. 黑旗军配合清朝政府进行援越抗法战争的阶段（从1883年到1885年）：在这一阶段中的主要战争有：山西之战、北宁之战、马尾海战、淡水之战、镇海之战、宣光围攻战、镇南关之战和临洮之战等等。

根据以上分期来看，我们目前有关论述中法战争的史籍基本上都只是局限于战争的第二阶段；因此，它是不够完整全面的。我们不当把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赞誉为民族英雄的刘永福所领导的黑旗军的光辉的抗法战争史排除在中法战争史之外。因为：正如第一次纸桥之战所显示，中法战争是以“移刘团而通滇路”开始的；也正如1885年6月在天津签订的中法《越南条款》所证实，中法战争在基本上又是以“移刘团而通滇路”来宣告结束的；虽说法国对此打了不少折扣，但是它却始终坚持了它的这项侵略原则。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注：

- ① 广西巡抚倪文蔚：《查探法越军报并近日布置情形折》，见丛刊本《中法战争》第5册第153页。
- ②④⑤⑬⑯ 堵希益：《东京问题的由来》，见《中法战争》第1册第408页（按“红河”一词，原书译作“红江”），第408页；第409页；第406页；第409页。
- ③⑦ 安邨：《柬埔寨以北探路记》，见《中法战争》第1册第451、458、460等页；第451页。
- ⑥⑩ 安邨：《东京问题》，见《中法战争》第1册第413页。
- ⑧ 马罗尔：《李维业远征记》，见《中法战争》第3册第326页。
- ⑨ 诺曼：《东京——法国在远东》，转引自《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12页。
- ⑫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第5册第4576—4578页。
- ⑭⑮ 转引自季南：《英国对华外交》，商务一九八四年版，第89页、第101页。
- ⑰⑱ 高第：《一八七四年法越和平同盟条约》，见《中法战争》第1册第377页；第379页。

- ⑲ 黄海安：《刘永福历史草》，见《中法战争》第1册第231页。
- ⑳ 诺曼：《远东诸民族与远东政治》，一九〇一年英文版，第127页。
- ㉑ 唐景崧：《请纒日记》，见《中法战争》第2册第60页。
- ㉒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一九一八年英文版，第344—345页。
- ㉓ 罗惇彞：《中法兵事本末》，见《中法战争》第1册第1页。
- ㉔ 刘长佑：《熟审边情敬陈管见疏》，见《中法战争》第1册第88页。
- ㉕②⑤ 法国外交部长德喀斯致海军殖民部长季格尔德杜希》，见《中法战争》第7册第121页；第122页。
- ㉖②⑦ 法国交趾支那总督卢眉致商业殖民部长卢维埃》，见《中法战争》第7册第138页。
- ㉗ 茹费理：《一八八五年二月八日和二十日的意见书》，见《中法战争》第7册第293页。
- ㉘ 顾奇：《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一九一三年英文版，第354页。